

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 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

邓燕华 黄 健*

【摘要】 学界对政治效能感多有研究，但已有文献更主要用个体性因素对之加以解释，缺乏考察宏观的、结构性的因素。论文结合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相关县域信息，研究区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均值而言，外部政治效能感随县域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发现，县域规模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作用不同。县域规模对处于低分位上的个体影响显著，但对居于高分位上的个体几乎没有作用。相关研究结果对政府管理与社会稳定维持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 县域规模 政治效能感 政府回应性 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16) 05 - 0145 - 18

一、导论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公民的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给予了很多关注。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将这一概念界定为“个体对政治与社会变迁是否可能以及他们能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感知”（Campbell et al., 1954: 187）。政治效能感一般被区分为内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和外部政治效能感（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前者是指公民对自己能够理解政治并影响政治过程的信念，后者是个体有关政府对市民诉求回应性的感知（Balch, 1974; Craig & Maggioletto, 1982; Niemi et al., 1991）。已有研究显示，内外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Craig & Maggioletto, 1982）。

* 邓燕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健，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XJC840006）。

研究者对政治效能感之所以感兴趣，主要因为它是调节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不少学者探讨政治效能感对选举这一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一些研究显示，那些信任当前政治系统并相信自己能够影响政治进程的公民，更有可能在各种选举中投票（Sabucedo & Cramer, 1991；Ragsdale & Rusk, 1993；Narud & Valen, 1996；Pattie & Johnston, 1998）。反之，如果个体对政府的回应性不满意，则更不可能参与选举。例如，有研究发现，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的投票率持续走低，主要是选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下降和政党认同削弱这两个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Abramson & Aldrich, 1982）。除了对制度化参与有作用，政治效能感也会影响个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例如游行与抗议。在已有研究中，有个经典的“低外部效能感—高内部效能感”命题。该命题指出，同时拥有低外部效能感和高内部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非制度化行动（Craig & Maggiotto, 1981；Pollock, 1983；Lee, 2006）^①。

正因为政治效能感会影响政治进程与结果，所以很多学者探讨了这一态度变量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社会经济地位（Easton & Dennis, 1967；Emig et al., 1996；熊光清, 2014）、政治社会化过程（Isaac et al., 1980；Morrell, 2005；Pasek et al., 2007）、媒体使用（Aarts & Semetko, 2003；Kenski & Stroud, 2006）、各种政治参与（Finkel, 1985, 1987；Madsen, 1987；Clarke & Acock, 1989）以及其他态度变量（Vecchione & Caprara, 2009；Anderson, 2010）等方面，分析不同个体在政治效能感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但总体观之，这些文献主要探讨个体因素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而缺乏考察宏观变量的作用^②。为弥补这个缺憾，本文研究区域规模这一宏观因素对中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二、区域规模及其影响

在各种宏观因素中，区域规模（Jurisdictional Size）是影响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所谓区域规模，通常是指一个行政区域内的人口规模

^① 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Gamson, 1968）和佩吉（Jeffery M. Paige）（Paige, 1971）等在更早些时提出一个相似的命题，认为具有高内部政治效能感和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更有可能卷入非传统的或抗议性行动。

^② 一些学者探讨了制度因素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如选举系统（Karp & Banducci, 2008）和立法机构构成（Milyo & Primo, 2005；Atkeson & Carrillo, 2007），也有极个别学者探讨利益群体与国家政权关系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朱妍, 2011）等。

(Oliver, 2000; Lassen & Serritzlew, 2011)。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来,不少学者探讨了最优辖区规模问题。在柏拉图看来,一个行政区域必须拥有一定人口才能得以维持。就当时的城邦而言,柏拉图主张5 040个居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规模。亚里斯多德也认为,区域规模应该恰到好处,不但要达到一定规模,以使辖区自立更生,又要足够小,能使贤者获得官职以尽其才,同时让市民彼此相熟、充分互动(Aristotle, 1948)。更为晚近些,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认为理想城市规模应在50 000到200 000之间(Dahl, 1967: 965);区域规模过大或太小,都有其弊端(Dahl & Tufte, 1973: 3)。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最优区域规模(Richardson, 1972)。

探讨区域规模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两大阵营,一派坚持“小而美”(The Small Is Beautiful),另一派认为“大而活”(The Large Is Lively)(Kelleher & Lowery, 2009)。这两个分支的研究,观点分歧主要体现在个体资源、政治兴趣以及动员效果三方面(Kelleher & Lowery, 2004)。坚持“小而美”的研究者认为,在规模小的行政区域中,居民之间彼此共享相似价值,公民参与的藩篱较少,同时地方官员对市民的诉求也更关切(Finifter & Abramson, 1975; Oliver, 2000; Ross & Levine, 2001; Ladner, 2002; Costa & Kahn, 2003),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民主的质量往往较高。而认可“大而活”观点的学者却认为,在规模较大的行政区域内,社区异质性通常较大,因此有着更多吸引公民参与的重要议题(Bachrach & Baratz, 1970; Burns, 1994),存在更多派系竞争。不同利益群体为了争取支持,会培训潜在支持者,向他们提供政治参与的知识与技术。不同利益群体的这类努力,最终会提高整体政治参与水平(Fishcher, 1995; Gray & Lowery, 1996)。

根据以上观点,区域规模与政治效能感的关系也可能存在两种类型。按照“小而美”派的逻辑,政治效能感会随着区域规模的提高而降低,因为在规模较小的区域内,政治往往更为具体,官员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这有利于促进民众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匹配,进而提升个体对政府回应性的评估,即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得到了增强。另外,小行政区域内存在的高同质性,会提升公民的政治兴趣,并将他们动员到政治过程中。随着公民不断卷入政治,参与经历会使他们更相信自己能够理解和介入政治。换言之,政治参与是一个学习过程,可以提升个体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但是,按照“大而活”派的逻辑,区域规模应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一方面,大行政区域的政府能力往往较强,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更有效率地提供多样化服务以满足公民的需求,进而加强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另一方面,不同利益群体为争取支持

而提供的相关培训，可以提高公民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即客观上会使公民内部政治效能感得到增强。

在现有文献中，只有一些经验研究探讨了区域规模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且无定论可寻。有的学者发现区域规模与政治效能感无关（Almond & Verba, 1963; Lyons & Lowery, 1989; Muller, 1970），而有的研究却得到相反结论，指出区域规模与政治效能感存在负相关关系（Finifter, 1970; Finifter & Abramson, 1975; Vetter, 2002; Lassen & Serritzlew, 2011）。这些文献大多不是专门而系统地探讨区域规模对政治效能感的作用，且一般也没有区分人口规模对内外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不过，拉森（David D. Lassen）和瑟利兹卢（Søren Serritzlew）（Lassen & Serritzlew, 2011）的论文是个例外。在他们的研究中，两位作者以丹麦行政区域改革前后所开展的两次调查为基础，通过准实验的方法证明区域规模对内部政治效能感有因果作用：区域规模增大，个体内部效能感降低。

当前，还没有经验研究系统分析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一般认为，内部效能感是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与一些稳定的性格特征紧密相关，比较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外部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易于受到情境因素和特定事件（如选举过程及结果）的作用（Clarke & Acock, 1989）。因此，如果拉森和瑟利兹卢（Lassen & Serritzlew, 2011）的研究验证了区域规模对较为稳定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有因果作用，那么我们有理由预期，这一因素也可能影响个体的外部政治效能感。

另外，现有文献还存在一个不足，即没有系统考察规模效应在政治效能感分布不同位置上的异质性。已有研究一般使用经典最小二乘法，分析政治效能感条件均值如何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在给定了可观测变量情况下，一些不可观测因素会使区域规模效应随政治效能感分布位置的不同而变动。比如，已有研究显示，政治资源的分布受到区域规模的影响（Borck, 2002）。如果政治资源会作用于政治效能感，那么区域规模效应对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不同位置上的群体也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在考察政治效能感均值的影响因素外，还要关注政治效能感的分布特征。

本文结合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相关县域信息，研究区域规模对个体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我们发现，就均值而言，外部政治效能感随县域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我们进一步发现，县域规模对在外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上处于低分位的个体作用显著，但对居于高分位上的个体几乎没有影响。

三、数据与变量

要检验县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者必须同时拥有个体层面和县级层面的信息。为此，我们整合了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0）、《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2009）》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信息，建构了一个专门的数据库。我们从CGSS 2010获得个体层面数据，从后两个数据来源得到区域背景信息，如县域规模、人均GDP、县域支出、民族区域自治等。

CGSS 2010采用多阶段分层次等概率抽样方法，其调查点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单位。首先，此次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另外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然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县（区）中，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随机抽取25个家庭。最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家庭中，随机抽取一名18岁以上的成员进行访问。CGSS 2010数据库的有效样本量为11 785。

本文研究县这一行政单位的规模效应。我们之所以关注县，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从历史角度看，自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后，县长期作为正式的行政单位，边界相对稳定（Ma, 2005）。相比，区在当今中国行政设置中，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县，但作为复杂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自主性远不及县。我们只考察县，而不关注区，主要为了尽量减少干扰因素，以使我们的研究更为稳健。另一方面，从当前来看，县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行政单位。它不但是地方经济的主要推动者，而且是基层政治的主要容器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相对于镇和市，县是更为重要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场域（Blecher & Shu, 1996）。因此，在中国五级行政单位中，县适于用来研究区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对CGSS 2010的样本进行了筛选，最后有4 675个观测量进入子样本，构成我们实证分析的基础。

接下来介绍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在现有研究中，很多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Balch, 1974；Craig & Maggiotto, 1982；Acock et al., 1985；Craig et al., 1990；Niemi et al., 1991；Morrell, 2003）。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利用CGSS 2010中的四个指标建构外部政治效能感指数。这四个效能感指标分别来自以下问卷测量项目：（1）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2）我对于政府部门的建议或意见可以有办法让领导知道；（3）政府官员会重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4）我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这四个测量项目的回应选项包括：（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无所

谓同意不同意；(4) 比较同意；(5) 完全同意。我们对这四个效能感指标进行重新编码，使每个指标在取值方向上保持一致，即“1”代表效能感最低，“5”说明效能感最高。我们用两种方法建构外部政治效能感指数。首先，我们使用因子分析法，建构出的指数是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连续变量（见表1），我们称之为因子分析EPE指数^①。另外，我们又通过加总方式，构建了一个以4为最小值、以20为最大值的离散型指数，我们称之为加总EPE指数^②。我们认为，通过两种方式建构外部政治效能感指数，并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这样可以增强我们估计的稳健性。

县域规模是我们关注的自变量。在本研究中，这一自变量数据主要来自《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2009）》，测量单位是千人。从表1可以看到，人口规模在不同的县中差异很大。最小的县不到10万人，最大县的人口却超过160万。在模型中，我们还控制了其他县域变量，这些信息来自《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2009）》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首先，我们控制了人口集中度，因为该变量是一个行政区域的重要特征，且已有研究显示它对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有影响（Kelleher & Lowery, 2009）。我们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衡量行政区域的集中度。在本研究中，赫芬达尔指数是一个县下属乡镇人口比例的平方和。然后，我们将这个指数放大100倍，使靠近“100”的值代表几乎整个县的人口集中在一个乡镇，取值靠近“0”意味着各个乡镇的人口规模相差不大。

一些有关行政安排的变量也可能影响政府回应性。中国政府赋予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以自治地位，同时自2000年以来的“强县扩权”改革又赋予一些县以更多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利。为了控制这些行政安排的影响，我们引进两个二元变量：民族区域自治（“1”代表一个县是自治县）和“扩权强县”（“1”代表一个县名列“扩权强县”中）。已有研究还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公共部门的规模会影响政府的行政表现，进而影响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Bjørnskov et al., 2008）。在这一研究中，我们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用每千人中公共部门雇员数来衡量公共部门的规模。我们同时还将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总人口的比例引入模型，以控制人口结构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层次的变量，这些变量来自CGSS 2010数据库。根据已有研究（Hayes & Bean, 1993；Lassen & Serritzlew, 2011；Bowler

① 因子分析的效度检验指标KMO值约为0.73，说明效度较高。

② Cronbach's Alpha（克隆巴哈系数）值约为0.7，说明信度较高。

& Donovan, 2002; Karp & Banducci, 2008; 李蓉蓉, 2014; 熊光清, 2014; 范柏乃、徐巍, 2014), 我们控制了年龄、性别、婚姻、民族、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另外, 我们引入两个二元变量: 户口 (是否具有城市户口) 和出生地 (是否出生在城市), 以控制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影响^①。我们还构造了两个二元变量, 以衡量个体的社会交往和互联网使用情况, 因为已有研究显示, 社会互动和网络使用会影响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 (Eveland & Hively, 2009; Anderson, 2010; Aarts & Semetko, 2003; Kenski & Stroud, 2006; 李蓉蓉, 2014)。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子分析 EPE 指数	0	1	-2.048	2.837
加总 EPE 指数	10.685	3.247	4	20
年龄	47.134	14.907	17	90
男性	0.487	0.500	0	1
已婚	0.833	0.373	0	1
高等教育	0.071	0.257	0	1
高中	0.148	0.355	0	1
初中	0.302	0.459	0	1
频繁使用网络	0.102	0.303	0	1
县域规模	5.275	3.583	0.810	16.750
人均 GDP	17.46	16.50	4.99	92.42
工作年龄人口比例 (%)	51.342	6.865	32.015	63.958
民族区域自治	0.127	0.334	0.127	0.334
扩权强县	0.362	0.481	0	1
赫芬达尔指数	10.606	4.883	3.706	22.096
公务人员数	24.857	11.334	12.425	66.358
观测量			4 675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有关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参见裴志军 (2014)。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和分位数回归 (Quantile Regression, QR) 分析这两种方法。首先, 我们使用 OLS 模型进行分析。OLS 模型是基于条件均值的回归方法, 能够解释因变量的条件期望与自变量的关系。但是, 均值只是描述随机变量的一种指标, 无法全面刻画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因此, 本文还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①, 探讨县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与均值回归模型相比, 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更有效地考察由于不可观测的特征, 而使县域规模效应对处在政治效能感分布不同位置的人群的作用。另外, 分位数回归模型弥补了 OLS 模型因数据分布的正态性假设或方差齐性假设无法得到满足而出现的缺陷, 因而更加稳健。

如前文所述, 因子分析 EPE 指数和加总 EPE 指数分别为连续型和离散型变量, 相应地, 本文在经验分析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我们首先运用标准分位数回归模型 (Standard QR Model) 对因子分析 EPE 指数做回归, 然后基于计数分位数回归模型 (QR for Count Model) 对加总 EPE 指数进行分析。标准的分位数回归模型不能用于加总 EPE 指数的分析, 因为离散型因变量不能直接作为自变量的连续函数加以处理。计数分位数回归模型是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而开发的计量工具, 使用该工具做分析, 可以得到自变量在不同条件分布上的边际效应。

在检验县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时, 我们可能面临内生性问题的困扰。首先, 区域规模的影响会受到一些不可观测的县域异质性的干扰。规模不同的县域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差异, 这在属于不同省份的县之间更是如此。例如, 因为历史、文化和地理因素的影响, 不同省份的县域人口相差很大。根据图 1 所示, 有些省份 (如安徽和江苏) 的县域规模大, 而像青海和西藏等省份的县域, 其人口规模通常较小。同时, 这些省份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可能显著不同。隔离这些因素的影响, 对检验区域规模和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至关重要。其次, 具有不同偏好的个体倾向于居住在最能满足自身需求的行政区域内, 这一事实说明个体决定居住地是一个自我选择过程。在中国, 经济发展机会和社会服务供给是影响人们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因为有着更多工作机会、更高收入水平和更好的社会服务, 往往吸引大量内地欠发达地区劳

^① 有关分位数回归模型, 参见: (Koenker & Bassett, 1978)。

动人口的迁入。这个自我选择过程可能使我们对区域规模作用的估计产生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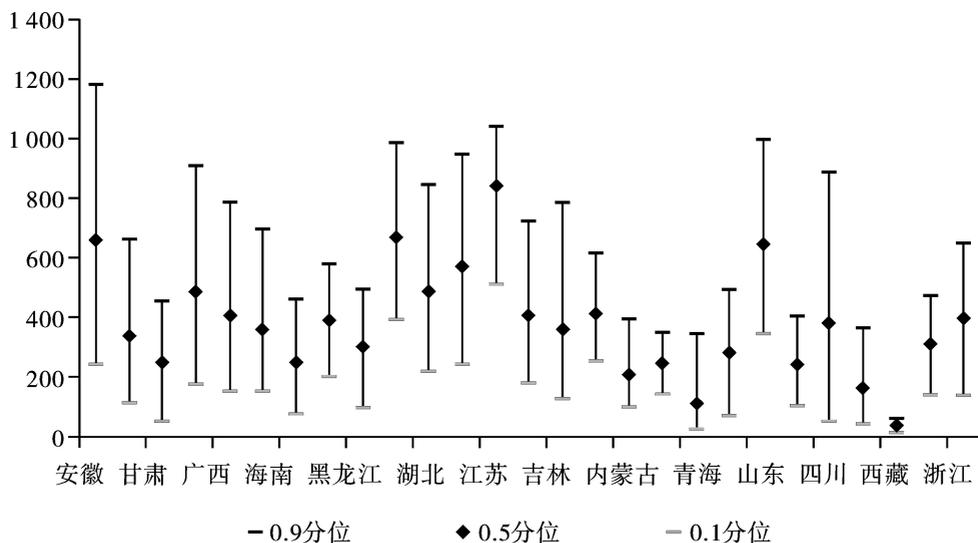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省份的县域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了解释因不可观测的省级特征而导致的省际间县域规模效应的差异，我们在 OLS 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中，都控制了省际固定效应。我们也控制了一些重要的县级特征，以进一步排除其他相关关系的扰动。特别是，我们控制县域人均 GDP 和处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重。因为，国内人口迁移主要是工作流动的结果，而人均 GDP 较低的县城更有可能是人口净流出地（Taylor et al., 2003）。另外，年轻人的流动性比其他年龄组高，更有可能为了工作而迁移到其他城市；同时，地方政府经常设置一些条件，使得只有那些在教育或经济上满足了相应条件的人，才能获得所欲迁入城市的户籍（Chan, 2010; Zhang & Tao, 2012）。正因为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可以很好地预测该地人口流动模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均 GDP 和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可以视为迁移过程中存在的筛选效应（Sorting Effect）的代理变量。

四、实证结果

我们首先进行了 OLS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列（1）和列（2）分别汇报了因子分析 EPE 指数和加总 EPE 指数的回归系数。这两个回归分析的结果都显

示, 县域规模与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使用因子分析 EPE 指数的回归模型中, 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是 -0.02 , 而在使用加总 EPE 指数的回归模型中, 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约为 -0.07 。这两个系数都在 0.05 统计水平上显著。经标准化后, 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基本相同。

表 2 OLS 回归结果

	(1)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男性	0.110 ^{***}	0.031	0.361 ^{***}	0.101
已婚	0.118 ^{**}	0.045	0.390 ^{**}	0.149
高等教育	0.369 ^{***}	0.093	1.204 ^{***}	0.307
高中	0.177 ^{***}	0.054	0.581 ^{***}	0.178
初中	0.033	0.032	0.096	0.104
频繁使用网络	-0.034	0.064	-0.090	0.211
赫芬达尔指数	-0.005	0.012	-0.016	0.039
民族区域自治	0.414 ^{***}	0.070	1.325 ^{***}	0.228
扩权强县	0.162	0.111	0.499	0.361
公务人员数	-0.003	0.004	-0.009	0.014
人均 GDP	-0.053 [*]	0.026	-0.168 [*]	0.086
工作年龄人口比例	-0.029 ^{**}	0.012	-0.097 ^{**}	0.039
县域规模	-0.020 ^{**}	0.008	-0.067 ^{**}	0.028
控制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R - Squared	0.111		0.111	
观测量	4 609		4 609	

注: 1. 标准误是经过县级聚类 (Clusters) 校正过的稳健标准误。2. 所有的回归都控制了民族、婚姻状态、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网络使用和健康状况等个体性特征。3. 显著水平: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 2 还表明, 一个县的行政地位也会影响个体的外部政治效能感水平。特别是, 民族区域自治县的居民更有可能肯定政府对居民需求的回应性。这或许因为, 拥有民族区域自治的县城, 享受到更多政府的优惠政策, 居民切实从中受益; 也可能因为, 区域自治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自主权, 因而能够更及时地回应居民需求, 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从而客观地提高了居民的外部政治效能

感。有趣的是，人均 GDP 和工作年龄人口比例这两个变量，都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呈负相关关系，这或许可以视为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自我选择问题的证据。一般而言，那些想要获得经济成功、要求更好社会服务的居民，更有可能不满于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以及对民众诉求的回应。同时，这些人也更不愿意留在相对落后的地方，而会选择迁到比较发达的地区。当然，发达地区中的这类人，因为往往没有更好选择而只能留在原地。这样，作为迁移筛选效应的代理变量，人均 GDP 和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同外部政治效能感负相关也就不难理解。其他的县域变量，诸如区域集中度和公务人员数，对外部政治效能感没有系统性作用。

OLS 回归的结果也反映了人口特征变量的影响。从表 2 可以看到，男性比女性在总体上拥有更高水平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更有可能对政府的回应性持肯定态度。另外，教育是影响外部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教育层次越高，个体的外部政治效能感水平也更高。这些结果反映的关系趋势，在使用因子分析 EPE 指数和使用加总 EPE 指数的两个回归模型中一致。

接下来我们看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分布问题。我们用因子分析 EPE 指数做标准分位数回归，用加总 EPE 指数开展计数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表 3 中。表 3 汇报了外部政治效能感在 0.1、0.5 和 0.9 三个分位数上各变量的估计值，这三个分位数分别代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底端、中部和顶端位置。

表 3 中的 A 部分是因子分析 EPE 指数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 0.1 分位上，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是 -0.043，且显著性水平为 0.01。在 0.5 分位上，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是 -0.027，这个数字与 OLS 回归模型中的系数相近。有趣的是，在 0.9 分位上，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是 0.009，这意味着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顶端，县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具有微弱的正向影响，但这一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表 3 中的 B 部分汇报的是加总 EPE 指数作为因变量的计数分位数回归结果。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 0.1 和 0.5 两个分位上，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53 和 -0.095，且都在 0.01 水平上显著。在 0.9 分位上，县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同样具有微弱但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在县域规模和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模式上，A、B 两部分的实证结果一致。

表 3 还汇报了其他县域特征变量对处于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不同位置上的个体的影响。可以看到，公务人员数、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和扩权强县等变量，都对处于低分位的个体影响较大。

表3 分位数回归结果

	(1)		(2)		(3)	
Part A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赫芬达尔指数	0.006	0.011	-0.003	0.010	-0.017	0.013
民族区域自治	0.451 ^{***}	0.143	0.421 ^{***}	0.134	0.576 ^{***}	0.161
扩权强县	0.317 ^{***}	0.106	0.175	0.106	0.105	0.126
人均GDP	0.001	0.004	-0.009 ^{**}	0.004	-0.003	0.005
公务人员数	-0.073 ^{**}	0.032	-0.088 ^{***}	0.030	-0.057	0.037
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	-0.056 ^{***}	0.015	-0.027 [*]	0.014	0.009	0.017
县域规模	-0.043 ^{***}	0.014	-0.027 ^{**}	0.012	0.009	0.015
控制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量	4 609		4 609		4 609	
Part B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赫芬达尔指数	0.006	0.038	-0.010	0.027	-0.057	0.036
民族区域自治	1.674 ^{***}	0.778	1.362 ^{***}	0.417	2.014 ^{***}	0.398
扩权强县	0.848 [*]	0.456	0.491 [*]	0.259	0.286	0.449
人均GDP	-0.190 ^{**}	0.095	-0.244 ^{***}	0.073	-0.158	0.115
公务人员数	0.006	0.014	-0.030 ^{***}	0.011	-0.008	0.017
工作年龄人口比例	-0.197 ^{***}	0.052	-0.097 ^{**}	0.046	0.009	0.044
县域规模	-0.153 ^{***}	0.051	-0.095 ^{***}	0.033	0.012	0.042
控制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量	4 609		4 609		4 609	

注：1. 所有的回归都控制了民族、婚姻状态、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网络使用和健康状况等个体性特征。2. 在计数分位数回归模型中，标准误是通过自助法（Bootstrap）获得的，重复抽样1 000次。3. 显著水平：*** $p < 0.01$ ，** $p < 0.05$ ，* $p < 0.1$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研究了区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发现。首先，就均值来看，外部政治效能感随着县域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其次，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我们进一步发现，县域规模对在外

部效能感条件分布上处于中低分位的个体作用显著，而对居于高分位的个体几乎没有影响。本文对现有文献主要有两个贡献。一方面，已有研究一般不是讨论区域规模对总体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就是单独检验它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利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县域信息，探讨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因此，本文扩大了已有文献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中国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另一方面，本文是运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政治效能感的首个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使我们不局限于研究外部政治效能感的条件均值，有助于我们检验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不同分位上的区域规模效应，因此该方法能够更全面地刻画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证明县域规模是影响中国公民外部政治效能感的结构性因素，同时说明“小而美”学派的逻辑相比“大而活”阵营的更适合中国国情。一方面，在规模较小的区域，政治更为具体，官员与公民的联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在中国赋权机制下，地方政府的行政裁量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行政级别（Ma，2005），县域人口规模的增加未必导致其政府能力的提高。至于为何县域规模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作用不同，这可能与个体在政治资源占有上的差异有关。拥有较多政治资源的个体往往有更大的影响力，因而拥有更多途径谋求政府的有效回应，所以他们可能比较不容易因区域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对政府回应性的评价。而拥有较少政治资源的个体，可能会更加偏好政治更为具体、官员更易接触的较小社区，人口规模扩大会降低他们获得有效政府回应的机会。但本文无法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该解释有待进一步检验。

虽然，县域规模只对在外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处于中低分位的个体有影响，但这足以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①，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如果地方政府不是主要采取就地城市化，而只是简单地将农村人口迁往城市，这将引起一个辖区内人口规模的扩大。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区域规模扩大后，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会降低。而已有研究又显示，外部政治效能感较低的个体，他们的政治信任和警察信任也更低（胡荣，2015），从而更容易卷入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数量增多又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化时，应多采取就地模式，而不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6.22%，2011年达到51.27%，2014年进一步提升到54.77%。

能盲目集聚人口，单纯扩大城市规模。

不过，大区域规模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是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加以化解的，如电子政务和赋权更基层政府等。电子政务通过现代技术，能提高信息传播速度，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Holliday & Yep, 2005）。电子政务的这些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区域规模扩大的负面影响。另外，赋权更基层的政府，使之有能力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需求，也能使个体外部政治效能感不受或少受区域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于将来的研究，我们认为还有必要探讨在更低行政层级上的区域规模变化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最近十几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区划调整，最常见的是村庄合并（邓燕华，2012）^①，另外还有乡镇撤并^②。这些区划调整必然提高一个社区的人口规模。这一结构变化是否会降低辖区内居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经验问题。

参考文献

- 邓燕华(2012). 村庄合并、村委会选举与农村集体行动. 管理世界, 7: 76-82.
- 范柏乃、徐巍(2014). 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10 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 11: 25-30.
- 胡荣(2015). 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 社会学研究, 1: 76-96.
- 李蓉蓉(2014). 影响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多因素分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 180-186.
- 裴志军(2014). 农村和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比较研究. 政治学研究, 4: 63-72.
- 田甜、唐婷(2015). 湖南乡镇区划调整: 逾 500 个乡镇 1.6 万个建制村将被撤并. 华声在线: <http://hunan.voc.com.cn/article/201509/201509221553467793.html>. 2016 年 10 月 7 日访问.
- 熊光清(2014). 中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五省市的实地调查.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 140-145.
- 朱妍(2011). 中产阶级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有效性的评价——比较中国与越南中产阶级的政治效能感. 青年研究, 4: 84-93.
- Aarts, K. & Semetko, H. A. (2003). The Divided Electorate: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5(3): 759-784.
- Abramson, P. R. & Aldrich, J. H. (1982). The Decline of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①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从 2004 年到 2011 年，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从 64.4 万下降到 59.0 万。

^② 最近湖南省启动了新一轮的乡镇区划调整，全省将撤并 500 个以上乡镇（田甜、唐婷，2015）。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3): 502 – 521.
- Acock, A. , Clarke, H. D. & Stewart, M. C. (1985). A New Model for Old Measures: A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7 (4): 1062 – 1084.
- Almond, G. A. & Verba, S.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M. R. (2010). Community Psychology,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 *Political Psychology*, 31(1): 59 – 84.
- Aristotle. (1948). *Politics*. Barker, E.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tkeson, L. R. & Carrillo, N. (2007). More is Better: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Female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on External Efficacy. *Politics & Gender*, 3(1): 79 – 101.
- Bachrach, P. & Baratz, M. S. (1970). *Power and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lch, G. I. (1974). 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Concept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1(2): 1 – 43.
- Bjørnskov, C. , Dreher, A. & Fischer, J. A. V. (2008). On Decentraliz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Economics Letters*, 99: 147 – 151.
- Blecher, M. & Shue, V. (1996). *Tethered Deer: 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rck, R. (2002). Jurisdiction Siz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Public Choice*, 113(3): 251 – 263.
- Bowler, S. & Donovan, T. (2002).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Attitudes about Citizen Influence on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2): 371 – 390.
- Burns, N. (1994).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A. , Gurin, G. & Miller, W. E.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Row, Peterson.
- Chan, K. W. (2010).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Migrant Labor in China: Notes on a Debat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2): 357 – 364.
- Clarke, H. D. & Acock, A. C. (1989). National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The Ca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4): 551 – 562.
- Costa, D. L. & Kahn, M. E. (2003). Civic Engagement and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 103 – 111.
- Craig, S. C. , Niemi, R. G. & Silver, G. E. (1990).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 A Report on the NES Pilot Study Items. *Political Behavior*, 12(3): 289 – 314.
- Craig, S. C. & Maggiotto, M. A. (1981). Political Discontent and Political Ac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3(2): 514 – 522.
- Craig, S. C. & Maggiotto, M. A. (1982). Measuring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8

◆ 论文

- (3): 85 – 109.
- Dahl, R. A. (1967). The City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4): 953 – 970.
- Dahl, R. A. & Tufte, E. R. (1973). *Size and Democracy*.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aston, D. & Dennis, J. (1967). 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s: Political Effic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1): 25 – 38.
- Emig, A. G., Hesse, M. B. & Fisher, S. H. (1996). Black – White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Efficacy, Trust, and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ritique of the Empowerment Hypothesis. *Urban Affairs Review*, 32(2): 264 – 276.
- Eveland, W. P. & Hively, M. H. (2009). Political Discussion Frequency, Network Size, and “Heterogeneity” of Discussion as Predictor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2): 205 – 224.
- Finifter, A. W. (1970).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2): 389 – 410.
- Finifter, A. W. & Abramson, P. R. (1975). City Size and Feelings of Political Competence.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9(2): 189 – 198.
- Finkel, S. E. (1985). Recipro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 Pane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4): 891 – 913.
- Finkel, S. E. (1987).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o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a West German Pane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9(2): 441 – 464.
- Fishcher, C. S. (1995). The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 Twentieth – Yea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3): 543 – 577.
- Gamson, W. A. (1968).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Dorsey.
- Gray, V. & Lowery, D. (1996).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Lobbying Communities in the American Stat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ayes, B. C. & Bean, C. S. (1993). Political Effic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st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Austral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3 (3): 261 – 280.
- Holliday, I. & Yep, R. (2005). E – Government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5(3): 239 – 249.
- Isaac, L., Mutran, E. & Stryker, S. (1980). Political Protest Orientations Among Black and White Adul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2): 191 – 213.
- Karp, J. A. & Banducci, S. A. (2008).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Twenty – Seven Democracies: How Electoral Systems Shape Political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2): 311 – 334.

- Kelleher, C. A. & Lowery, D. (2009). Central City Size, Metropolitan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1): 59 – 92.
- Kelleher, C. & Lowery, D. (2004).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Metropolita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Urban Affairs Review*, 39(6): 720 – 757.
- Kenski, K. & Stroud, N. J. (2006).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0(2): 173 – 192.
- Koenker, R. & Bassett, G. Jr. (1978). Regression Quantiles. *Econometrica*, 46(1): 33 – 50.
- Ladner, A. (2002). Size and Direct Democracy at the Local Level: The Case of Switzerlan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0(6): 813 – 828.
- Lassen, D. D. & Serritzlew, S. (2011). Jurisdiction Size and Local Democracy: Evidence on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from Large – scale Municipal Refor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2): 238 – 258.
- Lee, F. L. F. (2006). Collective Efficacy, Support for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8(3): 297 – 317.
- Lyons, W. E. & Lowery, D. (1989). Governmental Fragmentation Versus Consolidation: Five Public – choice Myths about How to Create Informed, Involved, and Happy Citize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9(6): 533 – 543.
- Ma, L. J. (2005). Urban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Changing Scale Relation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Political Geography*, 24(4): 477 – 497.
- Madsen, D. (1987). Political Self – Efficacy Teste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2): 571 – 581.
- Milyo, J. & Primo, D. M. (2005). Campaign Finance Laws and Political Efficacy: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Election Law Journal: Rules, Politics, and Policy*, 5(1): 23 – 39.
- Morrell, M. E. (2003). Surve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of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7(4): 589 – 602.
- Morrell, M. E. (2005). Deliberation, Democratic Decision – Making and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Behavior*, 27(1): 49 – 69.
- Muller, E. N. (1970). Cross – national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Compet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3): 792 – 809.
- Narud, H. M. & Valens, H. (1996). Decline of Electoral Turnout: The Case of Norwa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9(2): 235 – 256.
- Niemi, R. G., Craig, S. C. & Mattei, F. (1991). Measuring Internal Efficacy in the 1988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4): 1407 – 1413.
- Oliver, J. E. (2000). City Size and Civic Involvement in Metropolita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361 – 373.

◆ 论文

- Paige, J. M. (1971).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Rio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5): 810 – 820.
- Pasek, J., Feldman, L., Romer, D. & Jamieson, K. H. (2007). Schools as Incubator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Building Long – Term Political Efficacy with Civic Education.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12(1): 26 – 37.
- Pattie, C. & Johnston, R. (1998). Voter Turnout at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92: Rational choice, Social Standing or Political Effic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3 (2): 263 – 283.
- Pollock, P. H. III. (1983). The Participatory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A Research Note.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6(3): 400 – 409.
- Ragsdale, L. & Rusk, J. G. (1993). Who are Nonvoters? Profiles from the 1990 Senate El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3): 721 – 746.
- Richardson, H. W. (1972). Optimality in City Size, Systems of Cities and Urban Policy: A Sceptic's View. *Urban Studies*, 9(1): 29 – 48.
- Ross, B. H. & Levine, M. A. (2001). *Urban Politics*. Itasca: F. E. Peacock.
- Sabucedo, J. M. & Cramer, D. (1991).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Voting in Great Britai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5): 647 – 654.
- Taylor, J. E., Rozelle, S. & de Brauw, A. (2003).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1): 75 – 101.
- Vecchione, M. & Caprara, V. V. (2009). Personality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raits and Self – Efficacy Belief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6(4): 487 – 492.
- Vetter, A. (2002). Local Political Competence in Europe: A Resource of Legitimacy for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4(1): 3 – 18.
- Zhang, L. & Tao, L. (2012). Barriers to the Acquisition of Urban Hukou in Chinese C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Part A*, 44(12): 2883 – 2900.

责任编辑: 庄文嘉